

1918

罗定文史資料

第八輯



罗定县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 一、辛亥革命后县城的学校 谭焯基 (1)
- 二、黄荣球略历及邑人于民国二十年代至三十
年代初热心办学之简况 黄陶钧 (5)
- 三、回顾
 - 罗定中等教育忆述 潘森荣 (10)
- 四、谭明昭传略 黄竞钧 (15)
- 五、忆琴师 潘森荣 (26)
- 六、忆陈镜清老师 口述: 谭恩行
整理: 罗世盛 (29)
- 七、三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始末 张颖才 (33)
- 八、罗定古代瑶民考略 陈英林 (35)
- 九、唐宋时期泷州博物杂记三则 陈大同 (46)
- 十、罗定南江航运小史 陈大远 (51)

辛亥革命后县城的学校

谭 炳 基

晚清年代业已“废科举、兴学堂”。辛亥革命之后，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先后开办各类学校，为桑梓造就人才。记忆所及，仅将当时县城的各校情况略述如次，对于我县教育的沿革，提些鳞爪。

一、罗定中学，后来一度改称为省立第八中学，于一九一二年创办，校址设在县城大东门内，是我县唯一的最高学府。学制为四年，秋季始业。学生全是男性，来自三罗（罗定、东安、西宁）邻县信宜和广西岑溪等县也有不少青年负笈来校学习。莘莘学子都是走读，近校的回家或在附城亲友寄宿；远地的则住宿于各自设在县城的学舍或书院。中学课程有：国文、数学、理化、英文、史地、博物等，以及图、工、音、体专科。各科老师来自高等师范学校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园丁，担任国文课的多是前清秀才，所有老师都由校长聘请，任期在合约订明。老师循循善诱，学生听从师教，蔚然成风，校内书声歌声，此起彼伏，教学成绩，不断提高，获得社会赞誉。

全体学生都系穿着学校规定的制服，夏天以白扣布做衣料，冬季以大成蓝布做的文装。穿衣整洁，手拿课本，路过街

市，行人见之，不胜羡慕。

历届毕业生，不少考上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法政学校，也有升学到北京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有的考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余都在县里从事教育等工作，分道扬镳，蜚声百粤。几十年来，我县教育迈进省内较为发达县份的行列，罗定中学先走一步。

二、县立高等小学，为中学上送人才，相应开办。学校设在城内中军衙门，在后来彭氏宗祠的北面，是五六十年代教育局办公的地方。学制是三年，秋季始业。课程有国文、数学、英文、修身、博物等，以及图、工、音、体专科。课本均采用共和国教科书。老师多是秀才或举人以及中学毕业生或具专长的人士。面向全县招生，学生都是男性。入学前仿照中学模式，经过国文、数学考试，择优录取，在校张榜公布，榜上名次以总分高低排列，入选者看见榜上自己的名字，高兴异常。每个学期学生成绩，也是张榜公布，学科成绩以平均成绩高低为序，并列出操行成绩。学科在两个学期平均不及六十分考留级；操行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如两期评为丁等考，学校就饬令退学。不过留级或退学的，都是很少见。

县立高级小学，尊师爱生，形成风尚。学生们在课堂认真学习，下课时在操场和其他活动场所，玩着跳着，载歌载舞，处处出现，活泼的小学生，很得人亲昵。

三、励实学校，后来改制为云龙中学，又改为郁南二中，校址设在孔庙西侧的云龙书院。开办升中预备班，以复习高小程度课为主，辅导中学教材，师资都度与中学差不

多，学校经费依靠云龙书院的产业，学生多来自郁南，都是男性，有部分学生在校膳宿，校风较好，教学成绩也达到当时学堂的要求。

四、真道女子学校，设在城里基督教楼内，即现在县武装部的原址。由西人传教士主办，不受我教育部门领导。就读的都系女教友或她们的女孩，不向外招生，人数约有二三十，以识字为主，并讲神道，读圣经，唱圣诗，设有其他课程。他们办学的宗旨，不是扫文盲、学科学，而是培养妇女信仰基督，他们办学的目的就是这样。

五、应元小学，设在街中双龙关开元寺内，即现在中心市场与泽汇路之间。开设小学五、六年级为主，也有三、四年级复式教学，教材采用共和国教科书，学生全是男性。老师和学生的素质较好，教学效果也不错。

六、牖明小学，设在城里北关庙，开办初等小学，一、二年级复式教学，三、四年级单班教学，后期也办高小班，兼收男女生。教学进度与其他小学一样，效果也好。

七、人文小学，设在城里整弓顶，即现在幼儿园的旧址。举办初等小学一、二年级，招收男女儿童入学，为县城最低级的学校，低年级的教学计划能按时完成。

八、模范小学，即南区小学的前身，开办初级小学，一、二、三、四年级俱全，招收男女生，老师多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教学效果较好，为名符其实的一所初等小学。

九、敦本小学，后来改为石围小学，设在石围谭氏宗祠内，开办初级小学，一、二年级复式教学，三、四年级单班

教学。师生质量，和县城各校互为伯仲。

十、麟乐堡小学，曾一度改为第四小学，开设初级小学，都以复式教学为主，也有单班教学的。教学效果也能跟上县城各小学。

黄荣球略历及邑人于民国二十年代末 至三十年代初间热心办学之简况

黄陶钧

先父黄荣球字普勋，号增桃，罗定县城南永平村人，生于1881年。祖居“大夫第宅”（因远祖玉友公于清代曾任资政大夫而得名）传至祖父仲耀公时，丁口大增，（祖父有子五人、女三人）原屋宅已不敷居住，乃于附近土名“关塘”基处，另建造“黄福庆堂宅”一所，由是定居于此，祖辈多在清代科场中榜上有名，故父亲可称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从幼就立下“策祖鞭，继父业”之志，一心致身科举林，幼从学于家附近“文昌书院”，因勤奋好学，颇爱恩师之关注，于馆读时，大抵经、史、子、集多所涉猎、及至弱冠，时值清光绪废科举，兴新学，故父亲赶科场之愿落空，此时，广东已创办“两广方言学堂”是当时广东唯一公产之高等学府（即后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之前身）父亲以较好之成绩考进此校文史科学习，毕业后，回家乡，受新办不久之“县立高等小学校”聘为教师校长之职有年，时私塾被取缔，新学成风学校教员问题亟解待决，父亲改任县教育局长之职，有见及此，仍积极倡议邑中办一师范学校，以广为培养急需之教学师资，经多方奔走，得邑中之名流蔡廷锴、沈光周、黎庶望、区

寿年等之赞助，慷慨解囊集资，遂于1928年秋在县城旧“文庙”侧之“明伦堂”处（即今县中之饭堂）创办《罗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为《乡村师范学校》、《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等名称）父亲兼任此校第一任校长。此校由于深得邑中名流及各界人士之关怀及支持，故得以逐步发展扩充，不久，校址改迁至较宽敞之原清末旧试院及考棚处（俗称大营即旧罗师及其操场，亦即今县招待所及其广场），后此校已具规模，便正式定名为《罗定县立师范学校》。由是，他成为本县以至“三罗”地区小学教师之摇篮，由于罗师除有上述因素外，且又得县内之“两院”（即菁莪书院、德义书院）每年拨有定额之学租作为办学之经费，加上县拨之固定经费，是以学校能得以巩固并发展，且该校所聘之教师，规定均需具有“两历”者、（即大学毕业学历及教学有年之经历）、此校校风素称严格、朴实，由此，学生质量颇佳，备受“三罗”人士之称赞、与当时县内之《广东省立第八中等学校》（即今罗定中学）齐名，抚今追昔，罗定以至“三罗”地区所以有较好之文化教育传统，罗师及其历届师生，实贡献不浅。

罗定原为土地贫瘠，兼有十年九旱之患，是省内属物产稀少，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之穷县。世代邑人均自称罗定为“饿定”，日必“足足四餐”（实“粥粥四餐”之谐音）尽管如此，罗定自民国成立仅十数年间，即能使学校遍设，甚至穷乡僻壤处也办有“简易小学”，邑内青少年求学风气甚浓，其中贫苦子弟，虽挨稀粥、吃粗粮，尤踊跃上学，正是生活奇苦，犹弦歌之声，琅琅不绝，此特有之良好风

气，实与邑中有识之士，热心办学、助学甚有关系。其中蔡廷锴将军贡献尤为突出，他除拿出巨款资助邑中学校（如罗师浅中龙岩小学（后改称廷锴小学）等外；还着意物色作风正派，办事有魄力之老部下林鸿飞，委以罗定县长之重任、蔡将军还谆谆勉励林氏要克己奉公，努力为罗定大办好事，林氏不辜负蔡将军之付托，在掌罗定县政期间（1931年初至1932年末），除悉心整顿县内吏治、治安，广辟公路拆县城墙，修建马路，建设公园，图书馆……等公益事业外，对兴办教育事业，也多所出谋划策，林氏在罗虽任职仅二年，但政绩卓著，蔡将军及林氏之举，距今时隔已有数十年之久，有知当年情况者，至今犹津津乐道，传为美谈。父亲适逢此时，身任县教育局长之职，他受邑中名流及各界人士之委托和敦促，协助和规划并发展县之教育事业，也多所奔走，他特别重视倡议与督促县内各区、乡、镇，以及地方族姓，拨公产、租、祖尝办学，由是，除“两院”外，各区、乡、镇以及不少地方之族姓均拨有公产、租、尝业办学之定例习惯，故遍布全县之学校，由于经费有着落，而得以巩固发展。仅以县城及附近一、二公里之范围内而言，当时，此范围人口总数不超过二万人，而学校除有公立之罗中、罗师、郁南二中、县高小、女小外，还有地方办之模范小学、瞻明小学、人文小学、保定庵小学、牛圩小学……属族姓办者则有振南小学、谭屋岗小学、敬业小学、区屋小学辛屋小学（上述校名有些只记俗称，原名记不清）、总数不下十数间。以学校及其班级数，同人口计比例计算，其比例是相当高的，以上各类学校，一般收费甚廉，不少族姓

办者，还免收学费，是以让学生方便上学并安心学习。另外，县之“两院”，除每年定额拨公款、租办学外，还设置有奖学金条倒，对县内就读于大专和高中学校之学生，每年均给予一定之奖学金额。各区、乡、镇、以及族姓也多仿效此做法者。此外，县内还长期形成一良好习惯，即村、乡、族内之学子外出就学深造而缺乏费用者，乡人及族亲，不少均乐意出资帮助，以至学成为止。另外也有些学子，因经济困难，一时无法继续学成者，往往采取先停学，自行寻找职业，以获取些微积蓄后才继续复学而竞功业者。同时，也有时辍时复，卒至竟成者，亦有兄弟亲成之间，轮流学习和工作，共同关心，相互扶持照顾而完成学业者。上所举诸例，实不胜枚举。总上述，由于邑中之名流及各界人士之倡导和赞助，以及县内教育工作者之努力，青少年学子之自爱、自勉，顽强学习，早在抗日战争前，我县以全县人口与学校数和有各类文化程度之人数之比例，与别县比较是属于相当高一类之县份，从而出现有不少村有大学生，家有中学生之好现象，属贫脊，穷苦之乡竟赢得“文化县”、“文化之乡”之美名，因而与省内兴梅地区之梅县及兴宁县同享盛誉。

父亲任县教育局长约有五、六年（约1926年至1931年上半年其中兼任师范校长三年多）、1931年秋，（时陈济棠掌粤之军政大权），父亲调广州国民党省党部任职约一年后，调往海南岛临高县任县长，翌年，在任内患脑溢血症，辞职回广州治病，稍愈继回“省党部”任职，此时，陈济棠为了笼络人心，成立所谓民意机构，省、县两级参议会，父亲被

“选”为省参议员，代表罗定县参加省参议会，1936年陈济棠联合一批反蒋政客，发动“西南政变”事件，搞所谓“反蒋抗日”运动，结果为蒋介石所惯用收买利诱手段，使陈之部下不少相继反叛而被迫下台，树倒猢狲散，父亲也随之而去职，不久，便携眷举家，迁回家乡居住。由于，家道中落，加上政场失意，致郁郁不乐，而旧病复发，不治而去，终年为55岁。

回 顾

罗定中等教育忆述

潘焱荣

我想说的是解放前、后的几年间罗定中等教育的概况。这些片段的忆述，已经是数十年前的往事，错漏难免，就正于识者。

一九五〇年七月，全省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省教育厅里挂有一幅全省地图，把各县市的中学及学生情况，在上地图插上小红旗，标明数字及次第。梅县是全省以至全国之冠，省内顺次是中山、罗定……即是说罗定的中等教育在解放初期名列全省前三名。

那时全县有师范一间，中学十二间。学生共三千多人，教工三百多人。罗定师范、罗定中学、罗定一中（现附城中学），应元中学、郁南二中均在罗定城内。应中后迁榃滨，即现在的黎少中学；郁南二中属郁南领导，前身是云龙书院旧址，因此人事任免和财经仍是郁南管辖，教学业务则为罗定领导，后迁榃滨，（现榃滨中学）；素龙有福村中学（后并入五桂）和五桂中学（现素龙中学），船步有开阳中学（现船步中学），罗镜有泷水中学，太平有太成中学（后并入泷中、现

太平中学》，莘塘有陆秀中学（现莘塘中学），金鸡有大众中学（后并陆秀、现金鸡中学），泗纶有泗水中学（现泗纶中学）。罗中原是省立，罗师、一中是县立，郁南二中则是郁南县立，均属公办学校。其余都是私立，以收学费及一些校产维持，“德义”、“菁莪”两局及社会人士亦有资助，解放后政府定期给予补助、一九五三年全部改为公办。德、菁两局本是满清时代县内有识之士集资购置田产，把田租收入赞助赴省、上京的考生求取功名之用。解放前两局每年数十万斤租谷的公产被土豪劣绅把持以自肥。一九四六年夏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广州各大专院校学习的学生二百多人，在永汉南路（现北京路）金汉酒家集会；邀请蔡廷锴将军及邑中留省知名人士叶少泉、彭程、黎尚武诸先生莅临指导，两局主人陈小京亦被邀。在蔡廷锴将军等前辈的亲自干预后，两局的学租才基本上恢复办学、助学的用途。上述一些私立中学，便在此期间应运而生。

五十年代初，广州的卫生、技术学校及肇庆中学、肇庆师范都来罗定招生。那时的招生办法是把校考生意愿按省、地次及县内的罗中、罗师……顺序择优录取；军干校招生也选送了一批，很多是在学的，不少是优等生，有些还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青年学生报名参军的踊跃情况，送别时激动人心的热烈场面，老一辈的各界人士仍会有深刻印象。而那几年升上大学的人数却未因此受到多大影响。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县党的政领导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一些重大的群众性集会，不但有师生参加，主席台上也少不了师生的代表。县里的书记、正、副县长等常与师生

见面或座谈。县委书记简坚、赵连仲都先后到过罗中等校讲话。副县长郭天鹤在职仅约一年，城里的中学他是常客，离任时还亲自到校向校长们辞行。文教科长到邻近各校是常见的事。那时的机关干部是供给制，月薪只十五万元（当年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但罗师、罗中、一中、郁南二中的老师是每月四十五万元，校长、主任更多，教师的工资比干部多两倍，其他私校也差不多。我那时是文教科长兼一中校长，只领机关的工资每月十五万元，比中学工友的还低。

当年的中学只有一位校长和一位主任，文教科也只有一位科长，二至三位干部，却主管全县的教育、文化、体育工作，全县的行政业务和财经等工作都统集于这几位同志身上。不论学校或科里的同志，都积极工作，未闻有抱怨情绪。师生们对上级党政的号召能热烈自觉地响应。

罗定大学生之多是全地区之冠。为桑梓“百年树人”大计，客处异地的纷纷返县任教。现已花甲的老教师，不少就是解放初期回来的。当年的教师们政治上受到礼遇，经济待遇较好，工作积极认真，很少见异思迁向往大城市的情况。行政干部的足迹每年都遍及全县各中学。那时下乡是步行或骑（搭）自行车、汽车，只能到几个大圩镇。科里虽寥寥几人，仍常到各校与师生见面，了解有关业务和财经等情况，及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公私关系都颇融洽。

人事安排的具体情况：罗定师范校长谭埠基（中山大学毕业），罗定中学校长陈镜清（广东高等师范毕业——中大前身），继任校长陈汉杰（中山大学毕业），罗定一中校长辛其燎（广东高等师范毕业）继任兼职校长潘森荣（中山大学毕

业），应元中学校长吕雄才（中山大学毕业），郁南二中校长朱詠（广州大学毕业），五桂中学校长陈汝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福村中学校长陈大炽（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开阳中学校长辛凤鸣（文理学院毕业）泷水中学校长黄陶钧（文理学院毕业），太成中学校长梁元丽（中山大学毕业），陆秀中学主任陈铁墀（国民大学毕业——缺校长），大众中学负责人陆其标（文化学院修业），泗水中学主任黄汉存（文理学院毕业——缺校长）。各校的教导主任都是大学毕业，只个别例外，总务主任也有几位是大专毕业的。罗师、罗中的教师多是大专毕业，其他各校也约有半数，可见当年人才济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办好教育，没有人才，遑论建设？罗定素以教育发达著称，可是近年却显得匮乏，原因何在？“孟尝君能得士，士故归之！”“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改善经济待遇，对促进生产建设是互为因果的，意义深远的，凡事都离不开党的政策和公平合理。否则教师的安心与否不是一纸行政命所能解决的吧？！

布局问题：重点罗师、罗中，注意面上的一中、泷中、泗中，适当照顾其他各校。原有罗中、泷中设高中，后增泗中，成鼎足之势。既不是齐头并进，也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人力安排及招生为例，都适当照顾各校。招生的择优录取，对面上的仍根据志愿因应地域和考生经济情况等，保留一定数额的优等生。这就不至使面上的学校元气大伤，师生们仍有奔头，还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保持你追我赶的势头。对重点学校来说，面上搞得更好些，有更多的优等生可供选择，为什么不好呢？各校都有升上大专的，不是可以更大

限度地刺激鼓舞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吗？罗师是教育工作的母机，对奠定小学的良好基础关系重大，各方面的照顾是与罗中难分伯仲的。

为了增进师生们的健康，活跃身心，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全县中学生运动会。文教科是主持者，各校体育老师是实干者，那时体育运动的开展是普及而有生气。文娱方面活泼多样。话剧《刘胡兰》演出多场，备受赞赏，民间舞蹈晚会常在罗城各校举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响遍校园，秧歌舞，腰鼓舞风靡全县。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的英雄故事会，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学生那时的作业负担较少，课外阅读时间相对增多，因而知识广，视野阔，理想情操多能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发向上。与整天躲在课室里死啃课本，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高分低能”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局限于空洞的说教，着重生动活泼多种形式的正面教育。那时《红岩》《保卫延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等小说，每本是几十套给全班阅读，作为政治或语文课的辅助读物，老师予以指导，文体活动，课外阅读辅导等形式的潜移默化，是适应青少年特点的有效办法，教师应起积极的主导作用。

形势在不断变化发展。物换星移，昔日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是延绵不断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扬弃的观点来说，或许仍有“他山之石”的作用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于召庆

民主人士——谭明昭传略

黄 竞 钧

谭明昭于一九〇六年在罗定县附城区潭尾岗出生，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名其廉，字左颐。一九一三年他在罗定城外文昌庙与吴智泉等几人创办罗定县模范小学，从事教育事业。当模范小学开办时，明昭年刚七岁，即随父入这小学就读，成为邑内辛亥革命后兴办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升入罗定中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期间，他曾和县内中小学的师生们一起参加示威大游行。一九二〇年他父亲病逝，时明昭年仅十四岁，二弟景昭九岁，三弟朗昭七岁，四弟崇昭五岁，均靠他母亲耕织抚养成人；那时寡妇孤儿，历尽艰辛，这激发了他勤奋好学，自立为人之志。更由于“五四”运动深入开展，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便逐渐投身到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来。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组织。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罗定中学也吸收许多学生参加国民党，明昭那时也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夏天，中学毕业，遂到广州报考广东大学，但未被录取，于是返乡任太平